

关于位育的现代研究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这是从研究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这一热点引起的。美国新墨西哥首府圣菲（Santa Fe）以研究“复杂性”（complexity）为中心。1994年研究人员霍兰（J.Holland）提出“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理论，简称Cas理论。

人类究竟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复杂性的？是个难题。近代科学发展，学科越来越细，相互封锁、隔阂，缺乏整体观，更促使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性难予认识。

Cas理论的主要论点是：

（一）“适应性是造就复杂性，重要机制之一”。人的成长是在不断适应、创新中成长的。复杂性不是来自于神秘的外来的力量（上帝），而是来自于自身目的与主动性的，积极的“活的”主体。主体与环境反复的相互的作用，才是系统发展和进化的基本动因。也就是说主体是主动的活的实体（个人、群体、民族、国家），主体环境（包括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变和进化的主要动力。

（二）要把宏观和微观有机地联系起来，主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使得个体的变化成为整个系统的变化的基础。

（三）不能忽视随机因素，随机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活的因素，不仅影响系统状态，而且影响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

（四）世界的复杂性不仅是本来就有的，也是人类创造和发展的（以上资料见《系统科学》第8章：《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其应用》，主编许国志，副主编顾基发、车宏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从如上几点可以看到圣菲研究的研究成果与潘先生所论证的位育思想不少看法不谋而合。

#### 四. 一点感想：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位育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活动不是单边的（unilateral）而是双边的（bilateral），多边的。是互为条件、互通有无、互相依存的。美国新总统小布什一连串的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到处碰壁是违反位育原理的。

## 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邓锐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潘光旦先生逝世至今已有34年，今天这14卷《文集》经过精心编辑，终于出版，使人十分高兴。这无论在恢复一位大师的一度湮没的学说，使之成为天下人共晓，或者在振兴中国人文学科，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秀遗产上，都称得起是一件大事。

在潘光旦先生晚年，我曾经同他一起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他这一期间的生活情况知道的较多，有关追忆的文章已写过两篇，刊登在《中和位育》上，凡是在那里说过的，今天不想重复。回顾以往，我惋惜的是潘先生的多部著作，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因其学说遭受禁锢，我无从看到，而潘先生也从来没有向我介绍一二，这是不幸的时代潮流与不幸的个人遭遇使然。我虽然惋惜而不甚后悔，以故在上世纪60年代中，所能接触到的也多在他的生活方面。自优生学与社会学解禁以来，瞬间又逝去了二十多年，以我对潘先生的学说的肤浅的认识，印证记忆中的潘先生



的生活片断，想强调以下一点。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宋代以来曾有过朱陆之争，即“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入清后学者中朱陆学说之争以及宋学与汉学之争一度十分激烈。这是关系知识分子立志为学的目的与途径的辩论。我认为，于今后在中国知识界的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这种形式不同而本质近似的矛盾。这就是，我们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内读书、求知、研究、著作其终极目的何在？做人之道与做了事道孰为先后？读书研究著作与道德心性修养将融合为一体呢？还是分离为互不相涉的两概？与潘先生接触几年内，我看，他的为人同他的学识是和协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把朱陆学说与汉学、宋学完整通达地集合于一身知行合一，而且或许实际上把“做人之道”更看得重于“做事之道”。不像有些人言与行、学说与实践相背离，甚至以学术为竞逐名利权势的手段，论“文采”则富赡华丽，论“文德”则不无可议。

好学不倦，淡泊名利，总要想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做一分贡献，是潘先生持身之道。上世纪60年代我见到潘先生读书时，即使戴着眼镜，仍然要把脸贴在书上，他往往用会议间隙、午休时刻，争分夺秒读书。据潘乃谷姐妹的追记，她们说“爸爸在闻书、在舔书”，可知潘先生视力之坏可能从上世纪40年代即已如此。一位学者饱经忧患，视力衰退，仍然无怨无尤地继续学习，谋为世用，给我们树立了典范。当我们这一代人也进入晚年，才真正体会到他的不便与痛苦，也更懂得他以多么坚忍不拔的毅力来坚持工作。

潘先生任何时候总是心平气和，从来没有见过他情绪波动，没有看到他有忿怒、抑郁、怨恨的表现。待人接物，总是笑盈盈的。每当人们来访总是放下手边的工作，同客人谈话，也总是谈笑风生，从未沉默冷场使客人难堪。他并不把自己的时间，也就是自己的生命，看得重于一切，而是喜欢与人相处，以助人为乐。

自从曹丕提出“文人相轻”一词以来。这一积习至今犹存。轻薄地讥刺旁人的错误缺点而藉之以增加自我的优越感，在人际交往中并非罕见。潘先生和我在一起时他极少议论别人的差错，即便有一两次，而他的神情告诉我，他是在肯定并尊重别人的优点成就的同时指出某一点不足的，是与人为善的。

他求知与处人方面有如此好的修养，此外，他情理平衡，心理健康，通达宽容，在群体中不突出自我意识，这一切同所崇尚提倡的“中和位育”之道是一致的。今天，我们在阅读《潘光旦文集》时，如果对于他的为人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对于他的著作的领会更加全面和深入。

《文集》十四卷本，我前天才接到，匆匆地翻阅了两、三卷感到北大出版社确实为这部大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其编辑校对的精审，是近年出版物中罕见的。现随手拈出几个例子：（1）第十一卷〈日记〉。从1962-1964这三年间，潘先生〈日记〉上出现的人名至少有百数十，他记时或称“字”，或记“名”，但也有时听差或写成同意异体字的，编者不惮烦地逐一校核，询问了許多人，也问到我，如民族学院吴玉先生，加注或作吴钰。这就是很负责的工作态度；（2）第十一卷《存人书屋拊掌漫记》是潘先生记他与友朋间开玩笑一类的事，言语隽永，意味深长，有文字游戏与古典的巧用，在这类不容易一下子领悟其意义的故事里，我没有发现一处错印；（3）第四卷《历史人物世系稿》，编者遍检典籍，校对潘先生列出的何啻百千人的魏晋名士的家系，这是极为繁难的工作，如有一处编者对照《世说新语》新校本加注，于一个人名究竟是“草字头”还是“竹字头”，也未放过。

当前出版业兴旺发达，出版物充斥市场且优劣并见之时，有这样负责细心的编辑同志出版了



这样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真是使人兴奋不已的。

潘先生的著作这样多，但经过世乱、飘荡、封禁等等，于今所见大力网罗、精心编辑之后的成品，也有一些散失在外。潘先生前后执教并工作于清华大学、民族大学多年，本来由这两校搜集出版他的著作在名分上更为适宜，而北京大学出版社却勇敢地挑起重担，在十几年艰苦努力之后将硕果摆在世人面前，这充分地体现了北大以弘扬科学为己任、弘大兼容的校风，也是使我由衷地佩服的。

## 我的三点感想

——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葛兆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若干年前，曾经读过潘光旦先生的一些著作，这次重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卷本，又有一些感想。作为一个文史研究者，我很感慨潘光旦先生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深厚的文史功底，也很感慨潘光旦先生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连续意识和中国问题意识。我不是很了解社会学界的情况，如果把潘先生也算是社会学家，而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是来自西方的，它处理的基本上是共时性问题，那么，给我这个外行的感觉是，他似乎比一般的社会学家要更关心中国的社会、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同异、以及这种同异历史来源，读《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开封的中国犹太人》以及《性心理学》的注释，大体上可以知道，他在社会学的一般方法之外，他充分运用了他的传统文史知识，使通常的社会研究，增加了时间变化或历史延续的因素，从而变得更有立体感和纵深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性心理学》的注释，这种似旧实新的形式令人叹为观止，在这种看似旧学的注释中，来自西方的性心理学与中国的历史现象便交汇在一起，西方理论获得了中国文献的支持或修订，中国历史有了西方现代视野的观察，其实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范型，可惜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有类似的后续研究。

老一辈社会学家都有很好的旧学基础，也有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我平常很喜欢读吴文藻、陈达、李景汉以及费孝通先生的文字，潘光旦先生的著作也同样清通简明，说句不太中听的话，他们不像现在的社会学家的作品，一眼看上去满纸生涩，仿佛古人说的“诘屈聱牙”，而且总是像“报告”，仅仅依靠数字支撑理据，不容易让人读下去。记得很早的时候，我读《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觉得现在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应当像这样写，既规范又清楚。显然，文化修养的厚薄、学术训练的高下、历史知识的多寡，在所有的写作中都会表现出来，潘先生当年在这本书中曾经暗示说，文化、学术、道德修养，有很多因素，但是也要靠世代的“教育”和“遗传”，一个学科的风格和传统也是这样，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年轻的社会学家才能像潘先生那样？

社会学家潘光旦的研究领域并不都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不过，让人佩服的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敏锐和洞察，也不在历史学家之下。他在社会学研究的时候，涉及的一些历史问题，恰恰就是中国史中的大问题，比如他关心宗族的问题，关心科举的问题，关心民族融合的问题，其实都是大关节。从后设的角度去看中国历史与文化，它与西方社会与生活之差异，恰恰出现在这些大

